

蜜和刺

邵燕祥 著

00050301

江西人民出版社

邵燕祥著

蜜和刺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蜜 和 刺

邵 燕 祥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光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 印张 127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 10110·436

定价: 1.00元

从师心看文心 (代序)

——读邵燕祥的杂文和随笔

何西来

今年春天，邵燕祥把他近几年所写的杂文、随笔一类文字，剪辑在一起，说有出版社愿意出，准备交出去。后来，他交的是复印件，便将留底借我一读。我以先睹为快。

其实，在此以前，我就从报刊上很读过几篇。因为它们“于我心有戚戚焉”，而印象颇深，久久不忘。只是感受比较零碎，没有来得及仔细、系统地想过。这次放在一起重读，感觉依旧新鲜，心情仍然激动，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感受，便决心把自己的思绪稍加整理，形诸笔墨，以便与有同好者交流。不想被杂事迁延，一直拖到今天，连“草木莽莽”的孟夏也早过了，才有可能拿起笔来，了此心愿。

刘勰在《文心雕龙》上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这是他在风格论上的核心观点，其要义在于用临文者的才性的异同，来解释文体风格的千差万别，揭示人格与文格的一致。从这一点出发，他发现“叔夜偶侠，故兴高而采烈”，结论当然回到他的核心论点上去：“嵇康师心以遣论”。应该说，判断大致是准确的。我没有和燕祥谈起过刘勰的“师心说”。

及其对嵇叔夜的评价，不知道燕祥的具体看法如何。但我以为，他在诗文创作中所遵循的一条基本的美学原则却是师心。所谓师心，是指每提笔，必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抒写胸臆，阐发物理，言必己出，不唯上，不媚俗。因此，燕祥遣论裁诗，多能见出他的真实人格。

师心，是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提问题的，强调的是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能动性，独立性和独特性，它与师法自然并不矛盾。比如，情感，当然是主体的一种心理倾向，心意状态，但其来源却在外部世界，我国古典美学所谓“感于物而动，谓之情”，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再说，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来说，主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它们的对立，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所以，在艺术创作中，特别是在比较高明的匠师那里，师心和师法自然，其实是同一创作过程的两个互相联系的环节，或者说从两个不同角度对同一过程的强调和描述。不能一听师心，就以为是在提倡唯心主义，以为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等等。

照我看，在燕祥的师心的美学原则的后面，是他崇真尚实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哲学。唯其如此，他的文心和诗心，才都经由师心的艺术转化，而无不体现着他的人格。因此，可以说，他的师心，主要表现为“师真”。读过黄秋耘的《风雨年华》之后，他写了一篇《往事并不如烟》。在这篇文章中，他肯定秋耘的往事回忆“贯穿着史笔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也不为自己讳。”秋耘的文章笃诚、深挚，常将自己的情怀袒露给读者，不假雕饰，亦无矫情，有天然意趣。他的散文

集《丁香花下》就是这种艺术境界的代表，燕祥颇为推重，专门撰文加以评论。杨朔的散文，是写得很漂亮的，但我知道燕祥的评价却不甚高，以为有些地方过于雕琢，涉于做作，以致伤真，犯了艺术创作上的大忌。这也能从侧面印证他崇真尚实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

杂文虽“杂”，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却注重讽刺。这讽刺，不是揭人隐私，污人清白，更不是深文周纳，罗织人罪，陷人于不义。它们都和讽刺不沾边。诚如鲁迅所讲，“‘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污蔑而已。”燕祥是诗人，过去很少写杂文，就是讽刺诗，在他的诗作中也不多见。但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一年，他却写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杂文，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潜在的才能。他的杂文质量并不平衡，艺术上欠考究、欠打磨者有之，思想底蕴单薄者亦有之，但其成功者，如《元宵话起哄》、《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由蜗牛想到蚂蚁……》、《迪斯科诗话》、《打倒与骂倒》等，都足以使他列入当今杂文强手之林而无愧。他的杂文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解剖社会人生，笔锋所至，不留情面。但他决不把这看作仅仅是个人的侠义行为，而是看作为一种崇高的目的献身。那鼓舞着他，给他以勇气和力量的，是他作为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的责任心。他在《〈孔乙己〉诗话》里说：“为了促进我们人民民主制度的健全发展，今后倒是需要有更多准确、深刻的讽刺作品，真实反映重大社会矛盾的各种文艺作品。历史上曾有的灾祸并不能使我们的作家畏葸不前，望而

却步，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作家有最可宝贵的社会责任感，那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一起来认识生活，一起来排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这段话，既是他的主张，又是所追求的效应。他的许多杂文、随笔，无论多么尖锐，多么辛辣，辞锋多么犀利，都应从这个角度，这个出发点去理解。

《元宵话起哄》一篇，能够见出燕祥的素养和功力。他从“正月闹元宵”的“闹”字开题，诗词歌赋，古今中外，娓娓道来，文思飞动，潇洒自如，读来意趣盎然。文字洒得开，也收得拢，似乎全不费力，却处处紧扣着“闹”和“哄”的为害。字里行间，勾尽了一种畸形的世态人情。起哄的为害，世人并非不知，但邵燕祥却紧紧地盯住了那些上下其手的角色：“假如你曾在百货大楼门口躬逢早晨开门时被一拥而进，不由自主之感，或是在汽车站之类需要排队又不严格排队的地方冷眼观察过人流的涌动，你就会发现，在这种人流人潮中，总有少数人明里暗里使了劲，造成拥挤之势，而他们得以浑水摸鱼，以乱裹乱，掏兜，耍流氓，也有的只是为了起哄。”为起哄而起哄的，不过是些薛蟠式的人物，不足虑，也好对付，倒是前几种别有用心的东西，必须认真提防，稍不留意就会吃大亏。当然，百货大楼门外，公共汽车站边的起哄，到底是小事，即使有损失，也区区不足挂齿。但政治生活中的起哄，思想文化领域的起哄，就要远为可怕得多了。燕祥的文章由远而近，由小及大，层层剥进，写尽一种社会的和民族的病态畸形心理，促人深省，让人警惕，确实独具只眼。

《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在写作时间上稍后于《元宵话起哄》。如果说前一篇在解剖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后一篇则针对着一种复杂的、矛盾的、分裂的性格类型。培根早已在几个世纪以前故去，但作为一种集杰出与卑鄙于一身的特殊的性格类型，却并没有绝迹；在西方，在东方，都可以找到。这种人，以他们的才智为世界增添异彩，却也因其卑鄙而为害人群。燕祥的这篇文章，能给人以丰富的现实的联想。他在文章的结尾说：“培根登龙于三四百年前的英伦，他在彼时彼地有彼种表现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这样的人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不以诬陷、伪证、受贿等情触犯刑律，也还是可以用其所长。只是，切切不可授以大权就是了。贪图禄位和一心抢权的人，一旦得逞，就会滥用职权、营私为害的。”这样立论，其实是很公允、很宽容的。

多少年来，人们一般都把“文如其人”作为风格判断的通例，“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类，都是以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为依据的。但培根对此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反证。证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文也并不全如其人。其实，这个问题清朝的大学者纪晓岚已经注意到了。他在《文心雕龙》论及风格同人的品格才性的一致关系的地方批道：“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他的根据是：“由文辞得其性情，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纪晓岚读书很多，博古通今，他是很懂得文与人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的。照我看，燕祥对当代的培根型的人物，之所以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也充分考虑了人与文的复杂关系。此外，他还把人物性格中包含的某些复杂、以至矛盾的因素，都一并估计到了，倒也不一定是畏祸，怕报复。

燕祥是著名的诗人，却并没有那种耀眼的“诗人气质”。

他思路明敏、缜密，为人沉静，不走极端。从他考虑问题的全面和深沉上，从他捕捉问题的敏捷和准确上，不难发现那导引着他的理性。这理性，清澈如水，明亮如火。帮助他把艺术的触角一下子深入到人生的底层，从那里汲取、提炼出闪光的思想。清明的理性和深邃的思想，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这使他常常在别人止步的地方能够前进得更远些，从而赋予作品以深厚的底蕴，耐人寻味，启人灵智。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又不能不成为他诗歌创作之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转化为生动的情绪或情感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还不曾把思想加以诗化或艺术化的时候，他的诗作就表现出某些理性化的倾向。这种诗，往往会由于缺乏韵致，反而显得浅露。

但是，清明的理性在他的杂文、随笔之中却主要表现为长处，这使他的文风犀利而不流于偏颇，明快而不失其沉稳。在他的手里，杂文是他追求真理的利器。他是一个领略过人世沧桑，遍尝过苦辣酸甜的人，很懂得人生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那鼓荡在他胸中的是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遵循崇真尚实的人生原则和艺术原则，他无所畏惧。对于一切勇于献身真理的人，他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于一切为了人民的真实的文学，他都热情地给予肯定。他称赞刘宾雁是真正的战士；他较早发现了《绿化树》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为文推荐；对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及其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他也有极强烈的共鸣。总之，他个人几十年间的坎坷际遇，以及通过这际遇而磨砺得非常坚强的理性，使他真正懂得了国家需要什么，人民渴望什么，因而能够按准时代的脉搏，坚定地站在变革潮流的前

列。

一切前进都走着曲线，一切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虽然有时会遇到暂时的曲折，有时会吹来一股小小的逆风，但燕祥却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历史运行的主航道上前进。去年，是他杂文丰收的一年，写得比较多，也特别见光彩。这些杂文，既有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拳拳之心，又能见出他铮铮的风骨。它们很实在地证明，燕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决不是随风偏倒的小草。

今年夏天，他随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代表团南下广东，参观了特区，感触很多。那里，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打开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他从深圳、蛇口的步伐，看到了改革的广阔前景，心情异常激动。回到北京，他把自己的见闻和思考，陆续整理出来，写了一组《南行随想》，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上。《南行随想》在写法上不是正规的杂文，也不是纯粹的抒情散文，夹叙夹议，笔法比较灵活，正如它的题目所标示的，可以称之为随笔。虽然后来有人指责这组文章杂文不象杂文，散文不象散文，似乎入不了高雅的文学的殿堂，但我以为，它们却奏出了作者真实的心曲，唯其真，才颇有别人抹不去的价值。而且，我还以为，这支心曲，因为掙击保守，张扬开放，而与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相通，能够从中听到历史的回声。

这组文章的第一篇《眼底沧桑二十年》，以散文笔调临之，抚今追昔，不无感慨。旧地重游，个人二十年的际遇，国家二十年的徘徊，一齐涌向心头。由于开放和改革的方针的实施，国家才真正找到了出路。这里有一种历史感，它与公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结合，奏出了开放和变革的强音，

是以后各篇随想的共同主题。

在《南行随想》中，燕祥从服饰、肴馔、舞蹈、游乐，直到整个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全面地介绍了特区的变化，同时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在改革和开放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他的这些观点的核心是前进。在《怀旧与怀新》中，他说：“没有前进，则前功尽弃。不能‘怀新’的民族没有明天，则他们的辉煌的往昔也将埋没于历史的沙碛，纵有怀旧的情怀，仅存的旧物可能终于有一天并怀旧者一起无立足之地了。试读世界史，不是有这样的先例在吗？”为了前进，就不能不对某些怀旧者有所驳诘，有所辩难。有时，还会涉及某些邪恶现象，这时，则作者往往怒形于色，且多诛心之论。我想，这大约是他的这组文字后来颇遭物议的原因。

《迪斯科诗话》是这组文字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诗好，文也好。一次，碰到燕祥，我对他说，把这样的好诗好文，分别发表，也许能起到双倍的效应，合起来，则只能是一篇的效应。可以说“分则双美，合则两伤”。他笑笑说，是啊，从艺术上看是这样。但单独一首诗，没有后面的“话”护航，容易引起误解，讲不清楚，所以，只能如此。这就不难看出，即使在这些力主改革，鼓吹开放的文章里，他也并非毫无顾忌，将话全部讲尽。

然而，还是遇到了非议。而流言却正好来自文艺界。我很佩服某些文坛中人的“慧眼”，居然能从《南行随想》中，发现与党，与社会主义敌对的东西。私心以为，这很要懂得些当年“左”派们“上纲学”的“个中三昧”的。燕祥当然看出了其中的杀机，但却没有退缩，他把自己的愤怒化为锋利的辞章，写了《打倒与骂倒》，登在一九八四年第二

十期的《新观察》上。

文以气为主。这篇文章义正辞严，慷慨多气，颇见锋颖。它之所以有一股高屋建瓴的气势，并非仅仅因为事有切肤之痛，牵连到一己的祸福，而是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种仍然普遍存在的社会相，一种相当顽固，相当典型，而又大有害于世道人心的“左”倾遗风。把这种社会遗风，摆在解剖台上，操着霜锋逼人的解剖刀临之，这就使作者有了一个必要的，处于优势的道义高度，然后细分肌理，深察病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指出：“此风在文艺界偶或见之：它与妇姑勃谿、泼妇骂街、赵姨娘式的诅咒，虽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毕竟高出一筹。妇姑勃谿，不过是芥豆之争；泼妇骂街，也只图一时快口。而文艺界有人的挟嫌讥骂，往往却有更堂皇的旗号，有更深远的机心，有‘恶之欲其死’的怨毒，却又时或竟采取了公开或不公开的、书面或口头的文艺（？）批评的形式，不是一般嘁嘁喳喳之所及了。”

我知道，燕祥并不在乎别人射到他身上的冷箭，他见得多了。他感到痛心的倒是某种病态的社会风习入人之深，为害之钜：“有人不解，为什么文艺界有一度也曾遭‘骂倒’或‘打倒’的人，一旦重新爬起来，居然也会在这样那样的场合，不问是非乃至颠倒是非，大有骂倒四座之势呢？抛开主观的因素不论，也正由此可见，那曾经导致人们相对如乌眼鸡的旧时期的坏影响，入人何等之深！”这篇文章的末尾，邵燕祥引了陆游的两句诗：“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足证他的出发点仍在劝世，态度是极宽厚的，没有任何私怨的发泄。

燕祥的杂文和随笔，虽然包含了深邃的见地，却不故为

深奥；虽然知识性很强，却不见有意卖弄。这当然与他师心、崇真、尚实的美学原则有关。他的文字多从一片真情流出，故在谋篇、章法、结构上并不十分考究，即有此心，也决不露出刻意追求的迹象，真正可以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自然而已。他的《老鼠与新春》，《由蜗牛想到蚂蚁……》，就很能看出这种自然的理趣。《由蜗牛想到蚂蚁……》发表时，《人民文学》的编者虽然把它放在“杂文”一栏，却也完全可以当作散文来读。文字写得很美，很自然，有情致。但我喜欢这篇杂文，多半却是因为它观察问题的单纯角度和难得有的童心。

《老鼠与新春》写的是鼠年的新春，燕祥的一位画家朋友送来一张恭贺新禧的贺年片，他一下子被印在上面的木刻猫鼠图吸引住了，忽然有所发现，引出一篇哲理性很强的思考。他先对画面作了这样的描绘：“一猫一鼠，鼠处猫腹，那只公允平正之状可掬的老猫，一眼睁一眼闭，且不去管它；那只老鼠一边叉腰，一边指指划划，耸着小尖嘴，仿佛振振有词，倒煞是有趣。”接着他作了如下议论：“猫吃老鼠，这符合生态平衡的规律；老鼠吱吱吱，这也是它的本性天生。作者取此两端，合成一幅，若论什么主义，大致不离现实主义的谱——画家没有因为到了鼠年，就要么用笔来说老鼠一番好话，要么借老鼠硬编些悦耳动听的吉利话来；而仍然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勾勒写实，美丑妍媸，一任欣赏。”这就又归结到他的基本的审美理想上来了，于是他想起了“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燕祥在诗之外，还写了不少诗话，也可以归入随笔一类。但这些诗话却与前面讲过的《迪斯科诗话》，以及《〈孔

乙己〉诗话》、《“整人”诗话》等不同。它们是谈艺的，记录了诗人对诗的思考，《晨昏随笔》的集子便是。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前些时听燕祥讲，他想专心去写诗了，那才是他的本业，杂文就尽可能少写或不写了。我赞成他的前半意思，却不太赞成他的后半意思，所以劝他，以后有了杂文的材料，又不宜入诗，还是要尽可能多写；不可将开拓不久，已见成果而又可望丰收的园地撂荒了，那无论对社会，对读者，对他自己都是可惜的。他以为然。

燕祥的杂文随笔，并非篇篇珠玑，正象他的诗歌，未必尽堪传世一样，也见败笔，也有兴味索然之时。但是，我在文章中没有多讲这个方面。那用意倒不在护短，更不是为了溢美。他的诗名已经够高了，用不着这样。我只是想用足够的篇幅，从师心的角度，探察他在杂文、随笔中表现出来的人格。这人格，既是他的文心，也通着他的诗心。

“洗尽铅华见雪肌”。燕祥诗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风骨的人。不是讲价值吗？这正是价值的所在。我以为。

1985.7.10.上午11时40分于劲松寓所

目 录

从师心看文心（代序）……………何西来 1

——读邵燕祥的杂文和随笔

老鼠与新春…………… 1

真假材料与真假调查…………… 3

添砖加瓦与挖墙脚…………… 5

元宵话起哄…………… 8

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 12

为陌生的名字欢呼…………… 16

会咬人的语言…………… 18

我之炎凉冷暖观…………… 21

“靠党吃党”…………… 24

再说“靠党吃党”…………… 26

“专案遗风”考…………… 28

由蜗牛想到蚂蚁…………… 30

读史一得…………… 33

桃花及表扬与批评	35
看桃花有感	35
表扬也是一种批评	36
知识也不要“封顶”	38
健康与疾病之间	40
蠡县三题	42
富非罪	42
宽则活	45
聪明与糊涂	48
“整人”诗话	51
眼底沧桑二十年 —— 南行随想之一	54
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 —— 南行随想之二	57
谁更懂得对国土的感情 —— 南行随想之三	61
迪斯科诗话 —— 南行随想之四	65
佳肴·罐头·豆腐 —— 南行随想之五	71
广告的联想 —— 南行随想之六	74
卖国乎？利国乎？ —— 南行随想之七	78
怀旧与怀新 —— 南行随想之八	80
论刺激 —— 南行随想之九	82
走花乡 —— 南行随想之十	85
“不叫服装叫时装” —— 南行随想之十一	89
孙中山的讲演 —— 南行随想之十二	92
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人 —— 南行随想之十三	96
打倒与骂倒	99

“文坛”与花坛·····	101
批判“大批判”·····	104
浮夸升官可以休矣·····	106
“娘打儿子”论·····	108
肖与不肖·····	111
关于今人写旧体诗·····	114
往事并不如烟——读黄秋耘的《风雨年华》·····	117
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张贤亮《绿化树》读后·····	120
《晨昏随笔》自序·····	129
读《燕赵悲歌》四题·····	132
《岁月与酒》自序·····	139
识见第一——读冯英子《移山集》札记·····	144
一本谈古论今的杂文集——读高旅《持故小集》·····	149
关于《大地》的通信·····	152
小说中有诗·····	157
独对残篇忆而公·····	159